

·民族教育史研究·

## 北魏平城时期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官学 设置及文学教育

罗世琴 樊秋苹

(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 北京 100088)

**【摘要】** 北魏平城时期汉文化圈与以鲜卑文化为代表的民族文化圈彼此交融,形成一种多元共生的状态。当时的文学教育与经学相结合,从教育内容上面临如何在汉族文化圈以外传承汉族传统经典的问题。正因如此,北魏初期在官学设置上针对不同文化圈进行相对集中的分立教学,在选择教授人员及教学语言的使用方面,充分考虑不同文化圈的多元互补,进而体现出多元背景下不同文化之间彼此互融的特殊性。

**【关键词】** 北魏;平城;鲜卑;文化圈;官学设置;文学教育

**【中图分类号】** G529.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7178(2016)05-0132-05

DOI:10.15946/j.cnki.1001-7178.2016.05.021

自道武帝拓跋珪于天兴元年(公元398年)“秋七月,迁都平城,始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至高祖拓跋宏于太和十九年(公元495年)正式迁都洛阳,北魏平城时期的时间跨度将近100年。这段时间里,以北方汉族和久居中原的少数民族形成的汉文化圈与以鲜卑为主的新入驻民族文化圈(鲜卑文化圈)之间,彼此互融,形成一种多元文化共生的氛围。平城时期的北魏政权与其前后所建立的其他北方政权相比,虽然不时也有各种内外困扰因素,但整体社会态势是逐步走向稳定发展的。因此,这一时期的文教策令也在接受多元文化圈互融的背景下,独具特色。学界对北魏时期文学的研究,多从迁洛后的蓬勃发展与成就入手,而对平城时期则以“夷狄交驰,文章殄灭”论断。<sup>[1] (P.1869)</sup> 本文尝试从平城时期多元文化背景入手,分析其文学教育的特殊性,为探索这一时期

的文学与教育状况提供一个研究视角。

### 一、文学教育传承与接受主体的多元

北魏时期的文学教育并未单列进行,而是与对经学典籍的研读相结合,在“博通经籍”的过程中,同时也接受了文学教育。

《汉书·西域传》有“乃者以缚马书遍视丞相御史二千石诸大夫郎为文学者”句,颜师古注:“为文学,谓学经书之人。”<sup>[2] (P.3913)</sup> 北魏初期“偃兵息甲,修立文学,登延俊造,酬谘政事”,<sup>[3] (P.1081)</sup> “修立文学”的具体措施就是恢复并建立学校教育,其中也包括“太祖初定中原,虽日不暇给,始建都邑,便以经术为先,立太学”等。一些文学才能突出的人也作为经学传承教学的主力,如史载崔浩、高允、奚瑾、房灵宾、房宣明等,皆以文学显名而任中央、地方官学的博士教授之职:

**【收稿日期】** 2016-06-30

**【作者简介】** 罗世琴(1976-),女,甘肃白银人,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

樊秋苹(1988-),女,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本文为全国教育科学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多元文化背景下的中国古代文学教育——中国汉族与少数民族教育互动研究的视角”(项目编号:DMA140214)的阶段成果。

(奚)瑾少以文学知名。自中书博士,为中书侍郎……瑾有四子,秉、持、依并为中书学生……[4](P.1035)

(房)灵建子宣明,亦文学著称,雅有父风。高祖擢为中书博士。[5](P.972)

(崔)鉴颇有文学,自中书博士转侍郎。[6](P.1103)

除了直接因文学显名出仕,“文藻”也是当时人物评鉴时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史载房灵建“以才名见称”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有文藻”。<sup>①</sup>

《魏书》中《儒林传》与《文苑传》分列,《儒林传》17人,考其撰述主要在平城时期,并以文学创作显名,以梁祚、平恒为代表:

(梁)祚笃志好学,历治诸经,尤善《公羊春秋》、郑氏《易》,常以教授。有儒者风,而无当世之才……虽羁旅贫窘而著述不倦……为李訢所排,擢退为中书博士……撰并陈寿《三国志》,名曰《国统》。又作《代都赋》,颇行于世。[7](P.1844)

(平)恒耽勤读诵,研综经籍,钩深致远,多所博闻。自周以降,暨于魏世,帝王传代之由,贵臣升降之绪,皆撰录品第,商略是非,号曰《略注》,合百余篇。好事者览之,咸以为善焉。[8](P.1845)

《文苑传》9人,主要活动在平城时期且在太学任职的,以裴敬宪、卢观为代表。

(裴敬宪)少有志行,学博才清,抚训诸弟,专以读诵为业……司州牧、高阳王雍举秀才,射策高第,除太学博士。性和雅,未尝失色于人。工隶草,解音律,五言之作,独擅于时。名声甚重,后进共宗慕之。中山王将之部,朝贤送于河梁,赋诗言别,皆以敬宪为最。其文不能贍逸,而有清丽之美。[9](P.1870)

(卢观)少好学,有隗才,举秀才,射策甲科,除太学博士、著作佐郎。[9](P.1871)

在以经学传承为主要目的的官学教育中,文学教育一直都是较为重要的一个分支,自《后汉书》始,正史“儒林”与“文苑”分别立传已经成为正史修撰的传统。北魏初期,由于人才的匮乏与任用条件的限制等因素,二者的实际区分并不明显了,此时的文学教育与经学教育相融互见,呈现出相对胶着的状态。北魏迁洛后,文学发展迅速,

文学与经学分立进行表述的倾向就比较明显了,如史载李騫“博涉经史,文藻富盛。年十四,国子学生。以聪达见知”,将其经学底蕴与文学成就分立而述。

可见,北魏初期,文学教育活动并未专门单列,文学教育与经学教育彼此交融。这种相融互鉴的关系引发出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文学教育与其他文学活动之间的作用因经学的融入而相对疏离。文学的创作与欣赏等活动可以采用不同的民族语言进行,只要在民族语言文化圈内部获得认可,就有可能在一定范围内传承;但经学教育是以汉文化圈传统的汉文化经典为主要内容,对于入主中原的鲜卑文化圈的学习者而言,如何学习、选取怎样的学习内容及达到怎样的学习目的等,都是北魏平城时期学校教育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也就是说,这一时期的文学教育除了汉文化圈对汉文化经典的认可与传承外,还将面临非汉文化圈对汉文化经典的认可与传承,而后者,恰恰构成了文学教育多元的一个前提。第二,文学教育既然未能从经学教育中剥离,必然也受到文化圈之间互相接纳、交流的影响。为了让鲜卑文化圈能最大可能地接受经学教育,中央政府会自觉或不自觉地采取一些有目的的文教政策与策略,在教育层次、教育对象、教授人员选择等方面也都呈现出一定的多元倾向,形成较为明显的文教特点。

## 二、中央置学的多元倾向

北魏平城时期的中央置学有太学、国子学(中书学)、皇宗学,地方有郡国之学等,对这些由中央官学设立的学校,从政策上也给予了充分重视,《魏书·儒林传》云:

太祖初定中原,虽日不暇给,始建都邑,便以经术为先,立太学,置五经博士生员千有余人。天兴二年春,增国子太学生员至三千……四年春,命乐师入学习舞,释菜于先圣、先师。太宗世,改国子为中书学,立教授博士。世祖始光三年春,别起太学于城东,后征卢玄、高允等,而令州郡各举才学……太和中,改中书学为国子学,建明堂辟雍,尊三老五更,又开皇子之学。[10](P.1841)

<sup>①</sup> 《魏书》:“灵宾,文藻不如兄灵建,而辩悟过之。灵建在南,官至州治中、勃海太守,以才名见称。”见北齐魏收撰《魏书》卷四十三《房法寿传·附灵宾》,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971页。

北魏最初所立为太学,目的在于经述传承,所授以五经为主。国子学次之。国子学发端于西晋武帝咸宁年间,以教育贵族子弟为主要目的,惠帝时规定五品官以上子弟入国子学、六品以下子弟入太学。二者关系不是并立的,而是国子学隶属太学。<sup>①</sup>北魏国子学设立具体年代、与太学的具体关系等,能发现的直接记载很少,然此前西晋虽已设国子学,但称“太学”或“国子学”,至北魏天兴二年增置生员,则称“国子太学生”。由此,或可推断“太宗世,改国子为中书学”、“世祖始光三年春,别起太学于城东”前,或已出现国子学与太学相并立的迹象,二者设立的目的都在“偃兵息甲,修立文学”。其后“改国子为中书学”,更进一步明确其隶属于中书省,而不隶属于太常。“别起太学”,虽然强调了依旧例而为,实际上却更加明确了太学与国子学不相归属的性质;不仅如此,“别起”的太学在地理位置上也有所区分。

考其所置生员,据史载:

贺拔胜,字破胡,神武尖山人,祖尔逗,选充北防,家于武川。……胜弟岳,字阿斗泥,初为太学生,长以弓马为事。<sup>[11] (P. 1779)</sup>

尉拔,代人也。父那,濮阳太守。拔为太学生,募从兖州刺史罗忸击贼于陈汝,有功,赐爵介休男。<sup>[12] (P. 729)</sup>

(张蒲)父攀,慕容垂御史中丞、兵部尚书,以清方称。蒲少有父风,颇涉文史,以端谨见知……子昭,有志操。天兴中,以功臣子为太学生。<sup>[13] (P. 779)</sup>

(邓渊)祖羌,苻坚车骑将军。父翼,河间相。慕容垂之围邺,以翼为后将军冀州刺史、真定侯……子颖,袭爵。为太学生,稍迁中书侍郎。<sup>[14] (P. 634)</sup>

可见,当时的太学生并不都是来自汉族文化圈的。

国子学所立之年虽不可考,但“天兴二年春,增国子太学生员至三千”,到“太宗世,改国子为

中书学,立教授博士”,时间不长,<sup>②</sup>或可推测当时的国子学实际上很可能有名无实,其真正发挥作用是改为中书学之后。而中书学所收生员组成,与太学又有不同:

中书学几乎为汉人士族所占据……从史传可考为中书博士、学生者有一百余人,鲜卑子弟不过陆旭、陆凯、源规、源奂、奚瑾及其三子寥寥数人。<sup>[15]</sup>

以中书学代国子学,是否也有对所教生员进行相对集中分别教育的目的,不得而知,但从其培养的生员记载状况,确实反映出了相对集中的态势。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北魏太和中才设皇宗学,确切时间学界尚未确定。<sup>③</sup>迁洛阳后,仿古礼立四门小学以作为延续。设置虽晚,北魏皇族子弟的文教工作却在更早的时候就开始了,《魏书·儒林传》载:

梁越,字玄览,新兴人也。少而好学,博综经传,无所不通。性纯和笃信,行无择善。国初为《礼经》博士。太祖以其谨厚,举动可则,拜上大夫,命授诸皇子经书。<sup>[16] (P. 1843)</sup>

卢丑,昌黎徒河人,襄城王鲁元之族也。世祖之为监国,丑以笃学博闻入授世祖经。<sup>[17] (P. 1843)</sup>

梁越专攻《礼》,其学术有所专长,而卢丑入选为皇族授经的原因是“笃学博闻”,而不言其经学研究所所长。考卢丑为慕容鲜卑之后,慕容鲜卑重视对家族成员的儒学教育,汉化程度较高,豆卢氏是慕容鲜卑改姓后出现的一支。由此可见,当时对皇族进行汉文化熏陶与讲授之师的选择上,其实从一定程度上考虑了汉文化圈成员与鲜卑文化圈内汉文化接受程度较高成员,选择前者是为了保证能接受较高的汉文化传统教育,选择后者则投射出对其自身文化传统的兼顾,综合二者不失为文化融合初期的折中与均衡。

在对贵族子弟和皇族子弟的培养上,北魏官

① 《宋书》:“咸宁二年,起国子学,盖《周礼》国之贵游子弟所谓国子,受教于师氏者也。太康五年,修作明堂、辟雍、灵台。”见梁沈约撰《宋书》卷十四《礼志一》,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56页。《晋书》:“晋初承魏制,置博士十九人。及咸宁四年,武帝初立国子学,定置国子祭酒、博士各一人,助教十五人,以教生徒。”见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二十四《职官志》,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736页。《宋书》:“晋初复置国子学以教生徒,而隶属太学焉。”见梁沈约撰《宋书》卷三十九《百官志》,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217页。

② 天兴二年为公元399年,太宗世由永兴元年至泰常八年,也即公元409年到公元423年,相隔时间最长不出25年。

③ 皇宗学的设立,有学者认为在太和九年,如孙培青主编的《中国教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6-137页;也有认为是太和十六年,如毛礼锐、瞿菊农、邵鹤亭的《中国古代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210页。《魏书·孝文帝本纪》:太和十六年四月甲寅“幸皇宗学,亲问博士经义”,可以肯定是在迁洛之前。

学教育都呈现出一定的多元倾向:一方面,在中央官学的教育形式上,将汉文化圈和鲜卑文化圈的子弟进行相对集中的分立教学;另一方面,在教授人员的选择上,也充分考虑了两个文化圈的交融与互补。

### 三、文教过程中语言的多元并用

北魏初期政府曾设置专门“译令史”、“比官”等进行语言翻译,<sup>①</sup>这些专门从事翻译的官职在后来的设置情况并不清晰,这说明在北魏初期,语言与文化交流必须进行译介,但随着民族交往日益加深,日常语言的交流与使用已逐渐不成问题,仅仅在一些某种语言集中的地区才需要专门翻译。

(洛拔)长子文祖,显祖以其勋臣子,补龙牧曹奏事中散。以牧产不滋,坐徙武川镇。后文祖以旧语译注《皇诰》,辞义通辩,为外都曹奏事中散。<sup>[18] (P. 920)</sup>

此处“旧语”即鲜卑语。《皇诰》为冯太后所做,<sup>②</sup>以“诰”命名,说明是一种正式文体,且语言较为深奥,对于尚未与汉文化经过长期共融的鲜卑人聚集的北镇而言,人们理解起来比较困难,作为当时由语言共融区域流放的犯人,吕文祖却使用两种语言进行文本翻译并因此而被授以官职。足见,北魏平城时期,生活在文化共融地域的许多人具有多种语言并用的能力,吕文祖便是其一。迁洛后孝文帝将语言作为改革的一个重点:“(太和十九年)六月乙亥,诏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庭,若有违者,免所居官。”<sup>[19] (P. 177)</sup>不得不以强令对语言做出统一要求,也进一步证实了平城时期语言的多元并用现象。

不仅少数民族不断学习汉族的语言,汉族也在接受并学习少数民族语言,以适应大量内迁的其他民族,如:

崇弟懿,明辩而才不及崇也。以善北人语内侍左右,为黄门侍郎,兄弟并显。<sup>[20] (P. 1944)</sup>

孟威,字能重,河南洛阳人。颇有气尚,尤晓

北土风俗……后以明解北人之语,敕在著作,以备推访。<sup>[21] (P. 1005)</sup>

能够掌握汉语以外的其他语言,尤其是鲜卑语言,就能受到社会重用,成为出仕的一个捷径。这对于以传承经学、重视出仕的汉文化圈内的士族而言,无疑是一个较为有利的途径。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或可做出一个假设,在中央官学的教学中,可能使用的语言并非只有汉语。而太学与中书学的分立教学、皇宗学的“不知择师儒”,采用不同的语言进行经义和文学的讲解,可能也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北史》载有以胡语习儒家经典的情况:“文字亦同华夏,兼用胡书,有《毛诗》、《论语》、《孝经》,置学官教授子弟。虽习读之,然皆为胡语。”<sup>[22] (P. 3209)</sup>观北魏初期,鲜卑文化初入中原,语言的日常使用和功能本来就具有多元特征:“后魏初定中原,军容号令,皆以夷语,后染华俗,多不能通,故录其本言,相传教习,谓之‘国语’。”<sup>[23] (P. 947)</sup>这种境况一直持续到了迁都洛阳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又云魏氏迁洛,未达华语,孝文帝命侯伏侯可悉陵,以夷言译《孝经》之旨,教于国人,谓之《国语孝经》。<sup>[23] (P. 935)</sup>

除《国语孝经》一卷,《隋书·经籍志》还录可悉陵《国语物名》四卷、《国语杂物名》三卷。可悉陵为北魏皇宗族成员,又奉旨进行儒家经典的翻译工作,其所翻译的内容类似于普及性教科书。由此可以窥见,鲜卑文化圈的学校教育中使用的并非单一的语言,而是以“录其本言”的汉语与“以夷言”译其旨的民族语言相结合的方式。

北魏平城时期的文学教育,因不同文化圈交融的多元背景影响而呈现出一定的独特性。为适应这种文化多元,文学教育不是趋向于某一文化圈独霸天下的局面,相反,从中央教育机构的设置、使用语言、教授生员等方面,体现出了多层多样的特点。由此,也为我们考察中国古代民族文化的融合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视角。

<sup>①</sup> 《魏书》:“(天兴四年)十二月,复尚书三十六曹,曹置代人令史一人,译令史一人,书令史二人。”见北齐魏收撰《魏书》卷一百一十三《官氏志》,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973页。《南齐书》:“诸曹府有仓库,悉置比官,皆使通虏汉语,以为佳译。比官盖亦译令史之类也。”见南朝梁萧子显撰《南齐书》卷五十七《魏虏传》,中华书局2011年版。

<sup>②</sup> 《魏书》:“太后以高祖富于春秋,乃作《劝戒歌》三百余篇,又作《皇诰》十八篇,文多不载。”见北齐魏收撰《魏书》卷十三《文明皇后冯氏传》,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29页。

### [参考文献]

- [1] (北齐)魏收. 魏书卷八十五文苑传序[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 [2] (汉)班固. 汉书卷九十六西域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 [3] (北齐)魏收. 魏书卷四十八高允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 [4] (北齐)魏收. 魏书卷四十六奚瑾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 [5] (北齐)魏收. 魏书卷四十三房法寿传附灵宾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 [6] (北齐)魏收. 魏书卷四十九崔鉴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 [7] (北齐)魏收. 魏书卷八十四儒林梁祚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 [8] (北齐)魏收. 魏书卷八十四儒林平恒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 [9] (北齐)魏收. 魏书卷八十五文苑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 [10] (北齐)魏收. 魏书卷八十四儒林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 [11] (北齐)魏收. 魏书卷七十八贺拔胜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 [12] (北齐)魏收. 魏书卷三十尉拔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 [13] (北齐)魏收. 魏书卷三十三张蒲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 [14] (北齐)魏收. 魏书卷二十四邓渊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 [15] 姚宏杰. 北魏中书学新探[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06 (3).
- [16] (北齐)魏收. 魏书卷八十四儒林梁越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 [17] (北齐)魏收. 魏书卷八十四儒林卢丑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 [18] (唐)李延寿. 北史卷二十五吕洛拔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 [19] (北齐)魏收. 魏书卷七下高祖纪[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 [20] (北齐)魏收. 魏书卷九十一术艺晁崇传附弟懿[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 [21] (北齐)魏收. 魏书卷四十四孟威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 [22] (唐)李延寿. 北史卷九十七西域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 [23] (唐)魏征等. 隋书卷三十二经籍志一[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 Official School Literature Education under Multi-cultural Background in Pingcheng Period of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LUO Shi-qin , FAN Qiu-ping

(School of Humanities ,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 Beijing 100088)

**[Abstract]** In Pingcheng period of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 the Chinese cultural circle was integrated with the ethnic cultural circle represented by Xianbei culture , forming a new state of diverse symbiosis. At that time , literature education was combined with the study of Confucian classics , facing the problem of how to inherit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classics outside the Chinese cultural circle. Because of this , in the early Northern Wei Dynasty , discrete teaching was carried out according to different cultural circles in official school setting , and in the selection of teachers and teaching languages , and plural complementation of different cultural circles was taken into full consideration , reflect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tegrated multi-cultures.

**[Key words]**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Pingcheng; Xianbei; cultural circle; official school setting; literature education

(责任编辑 娜木罕)